

# 貝羅小說中「英雄受害者」

## 觀念之研究

陳凌

本文旨在研究梭爾·貝羅 (Saul Bellow) 的「擺盪的人」(Dangling Man)、「受害者」(The Victim)、「何索」(Herzog) 與「撒姆耳先生的世界」(Mr. Sammler's Planet) 等四本小說所蘊涵的「英雄受害者」(Hero-Victim) 觀念之本質及其運作過程。

梭爾·貝羅 (Saul Bellow) 是個擅長刻劃現代知識份子內在矛盾的小說家。他認為作家的首要職責，端在觀察與瞭解人類的心靈；他強調處在缺乏理性的社會，作家應該專注於事物的本質與精義，以探求一般人性的徵兆 (clean signs of a common humanity)，追尋心靈的舒展與創造生命的形象。同時貝羅對於現代文明的非人化 (dehumanized) 與工業社會的疏離感 (alienation) 亦表徵詞；主張以原始自然、個性尊嚴與「人類愛」(Human Love) 抗拒廿世紀現代社會的混亂、虛偽與苦悶。他自謂寫作的目標，旨在為擾攘不安的世界，創造一種秩序感。因此，貝羅以「作品中對人性的瞭解以及對當代文化敏銳分析」(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subtl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that are combined in his work) 榮獲一九七六年諾貝爾文學獎。

貝羅的作品係屬寫實主義，一種「受害者文學」(Victim Literature)；具有濃厚的「英雄受害者」(Hero-Victim) 的色彩。寫實主義的小說，其主角多非英雄，而是受到生存環境逼迫的受害者。儘管貝羅的英雄缺乏完美的人格，虛懸在社會疏離與孤立的邊緣，但對人性的潛能却不抱悲觀的態度，反以超世脫俗的行為肯定自我意志。貝羅深信：人生有悲歡離合，生命始具意義與深度；經歷痛苦越深，越可接觸生命的本質；面臨絕望的深淵，勇於掙扎奮鬥，方得以成就。準此，貝羅常用各種軟弱、悲慘、厄運與可笑的遭逢描寫人物，以構成追求個性舒展與維護人性尊嚴的主題。貝羅的英雄為追求個性舒展與維護人性尊嚴所做的犧牲與奮鬥，直指心靈而非肉體。這種「英雄受害者」觀念之本質及其運用發展，貝羅藉文學技巧隱喻 (metaphor) 在四本小說之中。

現代人生活中的痛苦與緊張，是源於擺盪在兩個世界裏—理想與現實。貝羅深知人類無法越過兩者之間的鴻溝，祇有盡力保衛存在其間的內在差異 (inner difference)，並尋求自知，俾從理想的世界中返回，適應現實的生活。

「擺盪的人」(Dangling Man) 敘述主角約瑟夫 (Joseph) 一心準備入伍，但召集令遲遲不下，使他既不能當兵也不便就業，兩頭懸空，恰似吊在半空中的人 (dangling man)。在為時七個月的等待期間，他無所事事，自由到極點，但他無法處理這種自由，這種自由使他

陷入社會疏離與精神掙扎之中。他孤零零地在空中擺盪，沒有歸屬，沒有認同，找不到生存意義與生活目標，而周遭環境對他而言，祇是個擺盪懸恍的空間而已。他的意志愈來愈消沉，現實生活的困擾更使他無法調整與社會的關係。嗣後雖經他極力奮鬥，仍不得不放棄自由與理想，屈從現實，為規律而嚴酷的軍伍生活歡呼。他的奮鬥過程賦予他尊嚴——一種偉大的人性尊嚴。

「受害者」(The Victim)描寫具有孤疑性格的亞薩·雷文紹爾(Asa Leventhal)為他姪子的病重而焦慮忙碌，同時遭受荒唐的柯爾比·歐碧(Kirby-Allbee)的迫害指控。這兩件事情促成他精神緊張和困惑。歐碧的迫害代表着外來的威脅與恐嚇，重重地壓在他心頭，搞亂他原有的生活秩序；歐碧的指控迫使他思考諸如道德上犯罪的問題，一個人對別人的責任及其限度問題，公平生存方式的問題等等。歐碧的影子無時不閃現在他腦際，雷文紹爾總是無法把他排除於思想之外，隨時都意識到歐碧的存在，因而他對社會懷有幾近憂鬱症般的畏懼，大眾已形成為壓迫他個人的巨大力量。他始終認為群體吞噬個人，社會決定命運。因此，雷文紹爾為求個己自由而疏離社會，以探索他所忍受痛苦的意義，經由痛苦的體會重新認識自己，與現實社會和諧相處。

「何索」(Herzog)的主要情節，迺在說明摩西·何索(Moses Herzog)第二次結婚與離婚前後的現實生活與心路歷程。何索是個高級知識份子，思想史教授。他體會婚姻、身世與私生活是種真正的苦難；把個人禁錮在虛偽、荒謬與罪惡的隱秘之中的苦難。他自覺受了極大的人格屈辱；這種屈辱的自覺使他行為怪異，使他不不停地寫信，試圖通過書信——一種社會性行為與內在獨白(interior monologue)——去接觸社會，表示他對社會的看法，估定他在社會中的地位。他在這種自虐的心態下，從事內省與沉思，企圖擺脫環境的桎梏，超越自我尋求拯救，以探討因此痛苦的意義。最後，何索澈悟知識份子的優越感與特權，是屬於某種形式的自縛與罪孽，因而達成精神的蛻變與重生。

「撒姆耳先生的世界」(Mr. Sammler's Planet)敘述年邁七十的撒姆耳日薄西山，行將就木，但不願束手就擒，坐以待斃，亟欲嘗試「死亡遊戲」；為克服死亡的期限而掙扎奮鬥。他認為逃避死亡即逃避現實；因為現實是由恐懼與美感所構成，逃避死亡的恐懼就無法欣賞人生的美感，無法欣賞人生的美感就無法接受現實，唯有面對絕對的生存與死亡，才能獲得拯救與新生。基於這一層認識，撒姆耳雖然倍受死亡陰影的籠罩，却不顧一切全力與死神抵抗，充分反映人性尊嚴的可貴，進而重新肯定生命的價值，欣賞苦澀人生的美感，終於瞭解遠離塵囂之際亦即接近真理之時，澈悟生存的意義與死亡的價值。

#### 四

貝羅的「英雄受害者」(Hero-Victim)都是都市中人，所描寫的也皆是熙熙攘攘的都市生活。都市既是工商業的活動中心，居民所追求與崇拜的也就是物質與金錢，但都市生活的大機器把個人碾得粉碎，個人的理想若非財富與成功，就無法適應而顯得孤獨、痛苦與疏離。他的日常生活既然不符合社會規範，其行為自然就被視為怪誕，成為受害者。不過疏離社會的英雄並非生命的否定者，他們知道現實生活雖然殘酷，但須努力掙扎與奮鬥，以肯定生存的意義，發覺生活的公平方式，俾建立社會的新秩序，使個人的理想與現實「統一」(unity)。貝羅認為要「統一」理想與現實，祇有通過「人類愛」，他相信「英雄受害者」的存在就是愛，惟有通過愛，疏離社會的個人才能獲得拯救。此即貝羅四本小說所表現的主題。

貝羅的小說未便視為純個人主義的作品；目的祇在處理主角一人的情思，應當着眼於作品的社會性，將作品的價值置於主角與社會的關係上。貝羅的主角之於社會，是一位觀察者而非參與者，更非能在社會上造成時勢的風雲人物。他們總是處在被動的地位，任人擺佈與折磨。因此，貝羅的英雄都是受害者；他們透過痛苦來淨化自己，希望為人類帶來救贖，然而人類却誤解他們，使他們倍嘗疏離社會的辛酸與苦楚，他們彷彿孤獨地面對俗世的群體惡魔。

貝羅小說的角色變化多端，人物年齡從二十歲到七十歲，生存奮鬥的環境從繁華的紐約到窮鄉的貝克夏山（Berkshire Mountains）。每個角色為維護人性尊嚴，都經歷獨特的精神奮鬥。撒姆耳曾說：人性尊嚴的光芒並非普通的品質，而維護人性尊嚴的潛力與生俱來。貝羅的英雄的精神奮鬥，即企圖擁有這股潛力。因此，貝羅的英雄都是倔強的，現實環境無法迫使他們自殺或毀滅。「英雄受害者」拒絕死亡；他們是死亡的敵人，他們堅決抵抗視生存與死亡為無意義的社會。貝羅的主角也沒有自殺的傾向與謀殺的行動，祇有嘗試停止精神掙扎與生活困惑的堅強奮鬥。

貝羅的主角無論是神經質的（neurotic），內省沉思的（introspective）或被虐的（masochistic），都是廿世紀文明社會的產物。他們擁有比精神奮鬥更高價值的人性尊嚴。他們雖然長期扮演受害者的角色，却堅持為人類救贖的奮鬥目標。這種奮鬥目標有道德的，不道德的，甚至非道德的，假使是道德的，則受害過程將益發感人，更易引起欽佩與敬畏。所以，成就英雄受害者的必要條件是「在有限的時空作無限的精神奮鬥」；而充分條件是「積極維護人性尊嚴，追求更高道德價值」，當二者結合時，便是一位典型的英雄受害者。

貝羅的人物都是知識份子，代表著西方的歷史意識與精神價值。他們的痛苦來自社會對他們的疏離與排斥；但他們又無法漠視自己所屬的社會。貝羅的主角似乎可視為願將自己的意識與人格碾成粉末，散播在芸芸眾生的受害者。貝羅的人物都輾轉於嘗試與挫敗之間，而嘗試何其軟弱，挫敗也是英雄式的。這些現代知識份子，也許有悲劇意識却乏悲劇作為的能力，反之，其他配角，或許有作為的能力却無悲劇意識。這是廿世紀現代社會的知識份子的命運——一種身心分裂的命運。

事實上，忍受精神奮鬥的痛苦與煎熬，乃是現代知識份子共同的經驗。人類的疏離、受害、荒謬與苦悶等存在主義的觀念，現代知識份子大都曾經迷失過。對於一位猶太作家而言，這些觀念不僅是抽象和流行的，且是他們種族的切身經驗。作為一個猶太作家，貝羅把「英雄受害者」的概念轉化成他的小說的主題，毋寧是理所當然的事。